



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由来与发展

张广友



河南人民出版社

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由来与发展

——皖豫鲁农村责任制调查与思考

张广友

河南人民出版社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

张广友

责任编辑 张素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联)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240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700册

统一书号 3105·444 定价 1.00元

序

万里

这本书收集的几十篇报道，从一个侧面如实纪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皖、豫、鲁三省一些农村实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以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报道对各地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编辑出版这本书，不仅有助于人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为研究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来的。它是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产物；是纠正“左”倾错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它一出现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象一切新生事物一样，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经历了激烈争论，冲破重重阻力，逐步发展起来的。过去在“左”倾思想影响下，长期以来一直是把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当作“方向路线问题”批判，包产到户成了衡量农村路线是非的标志，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由于思想上认识不清，行动上就犹豫甚至抵制。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这是个认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最能教育人。经过几年来的实

践，现在绝大多数同志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越来越一致了。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起来，解决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生产中的“瞎指挥”、“大呼隆”，使广大农民真正掌握了自主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充分发挥。它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国农民在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创造。由于在实践中，各地都特别注意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强调要由群众选择，多种形式并存，不搞“一刀切”，从而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健康发展，不断完善。

当前，农村形势很好，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新事物，新创造层出不穷。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脱离实际，思想跟不上形势，就难免出错误。正如有的同志说的：“谁多下去调查，谁了解实际，谁的思想就比较解放，谁的工作就比较主动。”我们要大力提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风。

这本书里所记载的大多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初期的一些材料。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发展和不断完善，必将会出现更多的新事物和更加喜人的新变化。衷心地希望作者们象过去那样，以满腔的革命热忱，继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写出更多更好的报道来，为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

前　　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是农民。农业的情况如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治形势的稳定关系极大。农业生产上去了，八亿农民稳定下来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的拨乱反正，农村最为彻底，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经验也最为丰富。当前农村形势最好，“一马当先，方兴未艾”。回顾一下四年多来我国农业所走过的道路，不仅对农村工作者，就是对城里人，也很有教育意义；不仅对农业生产，就是对工业和商业，也会有所裨益。

农村形势大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实行了以“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解决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使农业真正成了农民自己的事业，因而受到亿万农民的欢迎，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阻力大，争论多，从上到下，从开始到现在，都存在针锋相对的看法。

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和创造，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就曾几次出现过。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它受到过长期的“讨伐”，被戴上“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

义”等政治帽子。有些同志因为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它的生命力是这样顽强，批不臭、压不住、禁不止，落而又起，一再向人们显示着它“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一九七八年，安徽省定远县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农业大增产的报道发表后，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中共安徽省委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经济性质。他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表示支持。可是，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坚决反对。有的说他们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有的竟然号召“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分田单干风”，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安徽搞包产到户……。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你那个‘阳关道’可走，只好走我们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从那以后，“双包”责任制在激烈争论中迅猛发展，不断完善，到现在，仅仅几年的时间，全国实行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就从百万分之零点几，发展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许多长期穷困的地区在实行这种责任制以后，纷纷向贫困告别，结束了“三靠”的历史，结束了生产上恶性循环、生活上不得温饱的历史；有些生产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实行了这种责任制，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群众把它比做治穷致富的“钥匙”，称赞它是“很优越的一种责任制形式”，这是

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现在，说“双包”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独木桥”的越来越少了，而认识到它是社会主义“阳关道”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是一名记者，在“双包”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的激烈争论和实践中，比较长时间地在皖、豫、鲁三省一些农村采访，耳闻目睹大量事实，连续地作了公开的和内部的报道，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双包”责任制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有针对性地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报道现在不一定有多大价值，但至少是一份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应该说当初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感谢群众和实践给我的帮助和教育，使我在农村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洪流中，跟上时代的步伐，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

现在，从全国范围来看，责任制的大规模变动已经过去，正进入总结、稳定和完善阶段。新的阶段有新的问题、新的斗争。我愿意在实践中、在群众中受教育，和同志们一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完善责任制，对如何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作进一步的探索。

本书收集的四十八篇报道是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的。其中，前四十三篇绝大部分是通讯和调查报告，后几篇是“双包”责任制方面的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见解。

“双包”责任制是在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书前面几篇文章是从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开始的。定远县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报道，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那么，作为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生产者要不要有自主权？怎样才能使他们有真正的自主权？长

期以来，农村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大呼隆”要不要解决？怎样解决？一句话，怎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一些地方就开始出现了“包产到组”、“责任到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调查》和《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实行“六定一奖”、“责任到人”的调查》使人们认识到，“农业劳动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可是，有些人对此坚决反对，说联产计酬是“方向道路问题”，强调要“学习大寨经验”，“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针锋相对地写了《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省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抓点的学问——当涂县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度发展调查》、《多年来农村工作吃亏在一个“左”字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们学习讨论三中全会公报侧记》等报道。这些报道的中心思想是分清是非，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创造条件。一九七八年安徽省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减了产。于是有些人提出“安徽不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搞得好吗，为什么还减了产？”为此，我们写了《重灾之后访安徽》，以大量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安徽省的包产到户有了迅速发展。到一九七九年年底，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豫东、鲁西等一些地区也都出现了包产到户。一九八〇年一月，当时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讲了“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之后，以“双包”为主的联产责任制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淮河两岸，势若燎原烈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我这个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的记者，深为广大农民群众的欢欣鼓舞所陶醉，随着时代的烽火，风

尘笔戈，为“双包”责任制大唱赞歌，写了四十多篇农村见闻和调查报告，记录了这些地区发生的深刻变革。这些报道大多数都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本书除对个别篇章的个别地方作些文字修改外，保持了文章的原来面目。

书中有一少部分报道是和同志们一起采访、一起讨论合写的，其中《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实践的回答》、《实事求是的领导者》、《可喜的新动向》是我和吴象、李千峰同志一起采访、讨论，分别起草的，吴象同志作了比较大的修改，确切地说是吴象同志执笔的；《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是南振中、沈祖润同志执笔写的；《阳关道上迈大步》是崔葆章、范光华同志采写的；还有几篇是分别同吴象、刘葵华、刘宗棠、黄正根、陆子修、姚力文、田文喜、王礼砚、端木来娣、李海涛、陆学艺、崔贤云等同志一起采写的。考虑到报道的连续性和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也都汇集到本书中，特此说明，并向他们致以谢意！

在采访写作中，承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大量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张广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目 录

一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省委文件	(1)
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6)
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	(15)
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	(21)
灾年创高产 一年大变样	(27)
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	(37)
农业劳动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	(43)
抓点的学问	(51)
多年来农村工作吃亏在一个“左”字上	(58)
重灾之后访安徽	(64)
万里同志说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73)
生产形势很好 群众生活稳定	(76)
联产责任制威力大	(80)
从小岗生产队一年翻身看包产到户改变穷队面貌的作用	(83)
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	(89)
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	(92)
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97)
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	(101)
包产到户是不是权宜之计	(106)
“双包”责任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上的新创造	(109)

历史性的转折	(124)
巨大的吸引力	(133)
实践的回答	(139)
可喜的新动向	(146)
实事求是的领导者	(152)
实践使他们提高了认识	(158)
一年更比一年强	(167)
农民最欢迎包干到户	(172)
毛堂大队实行包干到户说明了什么	(177)
访贫记	(180)
丰收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恼	(192)
桥头粮食加工厂的启示	(197)
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	(201)
大包干 大变化 三年三大步	(204)
生产形势好 生活大变样	(211)
责任制形式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214)
从杨堂养鸡遇到饲料困难说起	(219)
要为包干到户说句公道话	(222)
派工作队帮助生产队完善责任制的做法好	(225)
“双包”责任制是“空了集体肥了自己”吗	(228)
责任制后的新课题	(232)
阳关道上迈步走	(243)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抓什么	(266)
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	(278)
允许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由之路	(289)
联产责任制与巩固集体经济	(295)

联产责任制与农业机械化.....	(305)
关于“双包”责任制发展趋势的探讨.....	(313)

一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省委文件

——记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的诞生

新年前后，我们到安徽省滁县和六安地区一些农村访问，在同这些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社员群众交谈时，他们一致称赞：“省委《六条》好！”

《六条》是中共安徽省委就当前农村存在的六个经济政策问题作的六条规定，是一份下发到基层各社队的省委文件。它的全称是：《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群众简称之为《六条》或《规定》。这份文件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发布的，其主要内容有：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加速发展生产；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等。这份文件是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狠批极“左”，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成果。它突破了许多“禁区”，针对当前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作了新的具体规定。比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等，都是过去文件中从没有过或不准许的，但又都是同广大农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这份文件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热烈欢迎。六安地区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时，高兴得眉飞色舞地说：群众对《六条》的那个高兴劲儿，

真动人！多少年也没有见到社员群众开会时这样热情。过去开会可难着呢。群众有个顺口溜：“干部挨门请，喇叭哇哇叫，到了开会时，一半人不到，干部一开讲，群众就溜号，剩下几个没走的，都在睡大觉。”这次宣讲《六条》可大不一样了，大家争先恐后来听。有的大队通知每户来一人，群众听说要讲新的政策，男女老少都来了，屋里坐不下，就到场院里去开。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来一遍、两遍。

一天晚上，我们来到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象看唱戏似地来听宣读文件。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站着侧耳静听，鸦雀无声。陪同我们访问的一位公社干部说，农村开社员会会场秩序这样好，过去是很少见的。我们走上前去问一位老社员：“冷不冷？”他笑着说：“听到新精神，天冷心里热，冷点儿没关系！”我接着问他：“你听了哪一条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大概今后不会再回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们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事了……”

深受极“左”路线之害的广大农民群众，渴望领导上能够及早拨乱反正，分清是非，解决农村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六条》文件还没传达到基层，它的基本精神就象一阵春风，吹遍了江淮大地。全椒县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六条》的一些内容，想急于探个虚实，便带上干粮跑了六十

多里路，到县委去询问。县委的同志告诉他确有此事，他两手一拍，兴高采烈地说：“这就‘着’了！”（对的意思）。按照省委部署，传达《六条》先干部后群众，可是来安县大英公社开始在干部会上宣讲《六条》时，附近生产队数百名社员听说召开干部会，内容是宣讲《六条》，也纷纷挤进来听。他们越听越高兴，有的说：“省委就象到我们队里来看过一样，这《六条》条条都讲到我们心坎上了。”广大干部对《六条》规定也很拥护。滁县地区一位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极‘左’路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党的政策，搞乱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生产上的‘瞎指挥’，限制养鸡，限制养鸭，限制养鹅，限制这，限制那，捆住了群众手脚，群众情绪低落，生产上不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六条》规定旗帜鲜明地澄清了是非，划清了政策界限，群众高兴了，干部好当了，真正抓到点子上了。农村形势一定会很快好转，我们当干部的、当领导的，工作也有信心、有奔头了。”

这份深得人心的省委文件是怎样产生的呢？

去年六月，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派了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同志加强省委领导，组成了以万里同志为第一书记的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安徽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迅速形成高潮，清查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进展迅速。这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进而思考一个问题：安徽基本上是个农业省，有四千多万农民，可是多年来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不少地方甚至连吃饱饭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地方甚至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外流讨饭。如果不及早解决广大农村问题，农业生产上不去，农民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晌全局，搞好全省工作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村问题。但是，农村主要问题是什么？这对解放以来一直搞城市工作的省委主要负责

万里同志来说，的确是个新问题。正在这时，滁县地委给省委送来了一份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使省委领导同志从中得到了启示。这个调查报告列举了“左”倾思想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表现。例如，“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污蔑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污蔑为“资本主义尾巴”；把勤俭办社方针，污蔑为“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把发展多种经营，污蔑为“金钱挂帅”；把合理的规章制度，污蔑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给整顿社队经营管理扣上“复辟”、“回潮”的大帽子……如此等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省委领导认为，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拨乱反正，解决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为了弄清情况，抓住要害，对症下药，解决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省委一方面组织有关单位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召开农村政策汇报会，听取各地汇报，多方了解情况。省委领导同志还亲自深入农村开调查会，直接听取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的意见，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召开省委常委会，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拟订并通过了《规定》草案，又经过几次反复修改，形成初步文件。但省委负责同志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使文件内容能够切合实际、解决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和书记顾卓新、赵守一等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社队宣讲《规定》草案，进一步征求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省委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第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再一次